

老夫妻

讲究的上海太太

吴翼民

还是早春季节，黎明时分，只要一起床，妻子第一要务便是把窗户开了个通透——房间啦、客厅啦、厨房啦、卫生间啦，直至我的书房，皆豁然开朗。是时我已经端坐在书房，正看着书或上着网或构思着创作，料峭的春风倏然溜入，禁不住打了个寒颤，遂用上海话调侃说：“帮帮忙，早饭还没吃，你先让我喝足西北风？”妻子笑回道：“喝点西北风蛮好，洗洗肚肠，清醒清醒脑子啊。”

不唯是新冠肺炎肆虐之时，就是往常日子，让室内保持通风都是妻子每天第一桩要做的事，几十年如一日，从不苟且。初时我臆测上海籍的妻子是不是从小住腻了弄堂里鸽笼样的带有老虎天窗的小阁楼，憋闷久了，恨不得房屋处处是窗、处处通透，是一种逆反心理。然而时间长了，乃悟得这也许是所有上海人的一大习性——“明月清风本无价”嘛，那么好的晨风，为什么不敞怀迎接入室呢？于是几十年来，我皆享受着无价晨风入室的清爽，及至前段时间疫情骤作，媒体一再提醒要开窗通风，我更体味到了妻子的先见之明。

现在我也养成了经常开窗通风的好习惯。这开窗通风啊，还可将街心花园的花树清芬引入居室，其如春的梅芬、秋的桂香，都是无价的呀。我曾跟妻子辩论开窗通风的得失，说是开了窗不

是也有灰尘吗？春季还有遥远北方送来的沙尘暴呢。妻子回应，沙尘暴毕竟是偶尔有之，况且还有窗前的树叶和窗上的绿纱抵挡过滤着哩。我终于服膺——上海太太的视野，不一样。

在我们家，随时洗手洗脸在妻子的硬性规定下也渐成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这是常识，要不为何现在都不叫厕所而叫洗手间呢？雅且一语中的，被普遍接受，至于有的地方把厕所叫做“听雨轩”和“观瀑楼”，趣则趣，近谑也。有次在南粤，我问路人厕所在哪，年轻的路人很茫然，赶紧纠正为“洗手间”，乃得到了指点。可在我们家，不仅饭前便后，我只要从外面回家，妻子必关照洗手洗脸。不仅如此，我下了电脑要洗手，看了报纸要洗手，做过什么事都得洗手。我又分辩过，说是有的星级饭店特意在房间留一字条：“报纸已经熨烫消毒，请放心阅读”，说明报纸是卫生的呀。她说那针对的是老外，老外习惯舔手，一边吃甜品一边翻阅熨烫消毒过的报纸便无虞啦，寻常的报纸不消毒可是沾满细菌，焉能不洗手？为此，她还一旁监视我，务必洗彻底了，肥皂和洗手液不可或缺，水龙头不可关闭，我说不浪费水吗？她就让我细水长流，如是才达标。我据理反驳过，说是上海做过调查，把刷牙时水龙头开着评为最大的浪费，妻子便反驳说，洗手和刷牙是两回事，洗手要活水不停才正确，刷牙不关龙头确实很浪费的。

王坚忍

一串小粽胸前挂

当年每逢端午节前，我丈母娘都要忙活几天。她是苏州人，会包白米、赤豆、鲜肉等粽子。这些粽子以形状分为三角粽、枕头粽、小脚粽等。一般用碧绿生青的鲜芦箬作粽叶，也有用隔年的淡黄色芦箬作粽叶的。在包好大粽子后，她把整张的芦箬剖成几小片，为我牙牙学语的女儿包一些比苏州采芝斋的粽子稍稍做点的小白米粽。小粽子包好了，就用一根长长的白棉线串起来，待煮熟后沥干了，挂在女儿的脖子上充当绿色的小“香袋”。

那时，我丈母娘家住石库门，灶披间是多家合用，烧煤饼，所以煮粽子是一桩很费时的事，一般要在锅中焖煮三四个小时，中间还要添一次水。煮粽子由我丈人负责，我女儿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当“小助手”，实际上是关心她的那串小粽子。等到粽子煮熟，看外婆将大粽子一个个放进竹篮子，上面搁上她的那串小粽子，吊在屋梁的通风处，她才肯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醒来，女儿吃好蘸白糖的赤豆粽后，将那一串像绿色小铃铛似的小粽子挂在胸前，一蹦一跳地由外公领着她上托儿所。当天下午她又挂着那串小粽子回家，兴冲冲地对外婆说：“班里的小伙伴们，还有阿姨，都说这串小粽子好看、好玩。我就骄傲地告诉大家，这是我外婆做的。”这时候，小粽子摸上去已经有点干硬了。外婆将小粽子的箬壳去掉后，一颗颗剥出来装在碗里，再起油锅将小粽子煎至金黄色。女儿端起碗，吃那外脆里糯的小煎粽，吃得是有滋有味，兴趣盎然。



富贵长寿 李鸿明作

任焯越

端午节还未到，天就热起来了。妻子说咱把堆着的棉花胎收起来吧，看上去老乌苏额，顺便把大床席子也拿出来，等用时，马上可铺上去。

下午，我与妻子一起，把棉花胎一条条抽成真空，放入床底柜中，累得浑身是汗。妻子说，吃力煞了，席子今天不拿了，还要寻呢。我说那我先寻寻看。

我走到隔壁房间，先打开榻榻米靠窗的边柜，柜角靠着一条装在席套里的短席，旁边是一包椅子的席套。妻子说这是当时没扔掉的小床席子。我接着打开旁边大柜的门，也没见席子。我又拉开过道大壁橱的门，里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像有席子的样子。我又

出门难免要坐公交。凡与妻偕行，她都会关照，尽量少摸座椅的把手，要摸，衬张餐巾纸，少说话不说话，遇别人开口，避着点，倘若车上碰到咳嗽打喷嚏的乘客，自己转脸或掩口，当然最好是戴口罩。我之前总认为她太过“疙瘩”，经常不以为意，结果时不时会中招，也惹得自个咳嗽喷嚏，幸好没有病毒流行，才侥幸躲过。这回大疫来袭，想想还是像妻子那样“疙瘩”点好。

还有经常性的聚餐，一大桌人逸兴遄飞，吆五喝六的，我发现妻子总不大肯下箸，只认作她太过“疙瘩”的脾性，于是经常代劳，替她兼菜，练得个筷功娴熟，仍不大讨巧。妻子的理由是大伙的筷子和汤匙都在盘子里兼啊喝的，不仅觉得有点不卫生，更担心的是唾液传播病菌。当时亦不以为意，经过此次疫情如泰山压顶，乃觉得太太有时“疙瘩”得有理。

娶了个上海太太，我也渐渐改掉了许多不卫生的习惯，比如两天不洗个澡就觉得难受，日子稍长点不换个被子就觉得糙人，只要丽日当空，必将被子垫褥晒个松软，晒得个太阳味蓬然。记得妻子曾跟我说过，她当年下乡插队落户，最牵挂的竟然是上海外公外婆睡的被子，每次回到上海，第一要紧的事就是给老人家拆洗被子，大冬天在后弄堂的水泥板上刷牙洗的，一任手冻得像红萝卜，也务必将布细眼都刷得干干净净方能安心。

林重耳

母亲生下我时已经41岁

记得我刚读小学一年级，她紧抓着我的手送我去学校。别的小朋友问我，“这是你阿婆啊？”幸亏班主任祁雨田老师为我解了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大家庭十多人，其中三个小孩，当时家庭总人口远超当年计划分配时期大户标准（全家人口达到五人算大户），粮油等主副食品十分紧缺，加之各种困难纷至沓来，这十年里，母亲身上担子有多重，可想而知。

每天一大清晨，母亲两手各提一菜篮去菜场买菜。她原来裹过小脚，走路重心不稳，摇摇晃晃，看她背影，心中凄然。她一回到家，立刻着手拣菜清洗，炒菜煮饭，一大家子人要上饭桌啊！六七十年代，家中尚未用上煤气，仅仅依靠一只煤球炉。到了下午，又要洗衣物，到楼上晒台去收晾……如果遇到雨天或寒冬日子，煤炉上面放一个架子，用来烘干衣物。母亲手上满是冻疮，有时没包好，血水还渗漏出来……我至今回想起来还心痛不已。

但母亲一直教育我们，自己艰苦一点不要紧，助人是必须的。老家客堂间墙壁上挂着一个老式电话机，母亲把电话号码告诉邻居，我每天下午放学回家，若铃声响起，就立即去邻居家叫邻居来接听电话。母亲说外面电话少，别人家打进来大多是有急事，去叫来接听才好。

若干年后，恢复高考，我三十出头也去应考。几个外甥女和外甥，几年后也考上了大学。我们全家人都想让老人享享清福，不料，母亲不慎摔倒骨折，从此卧床不起。更让我惴惴不安的是，她始终牵挂着我这个小子的人生大事，她支撑着，直到我近四十岁结婚的次年才驾鹤西去。写到这里，我潸然泪下，难以释怀。

七十年代时，因家中拮据，我每月收入仅三四十元，上交母亲二十元。到了月底，母亲还会向我要五元、八元，多年下来，也是一笔数字。母亲临去世前，还在床边悄悄和我说起，“这笔钱，我一直没归还你啊”……想到这儿，我又是一阵阵心痛！

眼皮子底下

返回卧室，拿只方凳爬上去，用手摸了下大橱顶上，仍不见席子的踪影。

我与妻子回忆着，去年大床席子收起来后，放哪了？妻子说，记得好像是与椅子席套一道收起来的，现椅子席套在，那大床席子呢？我说六尺长的席子，竖起来横下去都是一大截，会藏到哪里去？

我对妻子说，我再“地毯式”搜一遍，实在找不到，会不会放在隔壁的老屋里？妻子没好气道，谁知道呢！于是，我从橱到柜，又寻了一遍，还是没找到席子，就拿了钥匙要去隔壁老屋，妻子拖着我说，天也暗了，明天再去吧！

晚上看完电视剧已很晚，妻子躺下不久，就打起了轻微的呼噜。我迷迷糊糊刚欲入睡，只见妻子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有了！这条短席就是我们要找的大

床席子！我们去年买的是中间可对折的席子，一折起来，不就是一条短席的长度吗？

我与妻子赶忙冲到隔壁房间，打开榻榻米柜门，拿出短席，扯去席套一看，果然是我们找了几遍的大床席子。

第二天，女儿打电话来关心找席子的事。我对女儿说，我们真老了，明明就在眼皮子底下，却满世界去找呢！女儿说，这就是灯下黑啊！

挂了电话，我对妻子说，你还记得当年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的那个老狐狸吗？最后公安人员千辛万苦挖出来的特务竟是他——一个天天见面，却不引人注意的扫地大爷。我们费劲找到的席子，不就是那个就在眼前的“老狐狸”吗？！妻子道，什么老狐狸啊，现在谁还知道？

亲母亲

母亲一直惦记的事